

從文章評點看南宋時文與 古文「論體」之交涉及其意義 ——以柳宗元〈封建論〉、 徐霖〈太宗治人之本〉為例*

蓋琦紓

高雄醫學大學語言與文化中心教授

提 要

自北宋中期科舉考試改以策論取士，逐漸出現一些流弊，唐庚提出「以古文為法」，倡導時文學習古文法度；南宋文章評點的出現更促進古文與時文之互動、交流。首先，本文論述古文「論體」至時文「論學」發展，指出古文文法、時文程式逐漸相互融滲，在宋、元期間作「論」已成為專門學問。其次，以兩篇選文——中唐柳宗元〈封建論〉、晚宋徐霖〈太宗治人之本〉做具體討論，宋人雖批判柳文觀點，仍推許〈封建論〉「真可為作文之法」；而徐文之立論除源委於柳文外，尚反映當時理學思潮，並取法唐宋古文長處。

* 本文為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南宋古文與時文『評點』之交涉研究」（MOST107-2410-H-037-005）成果，承蒙貴學報匿名審查人之指正，謹此致謝。

此外，本文指出時文為命題作文，審題立意是前提，文章鋪陳皆自此前提開展，而逐漸形成一套程式，這應是時文與古文之重要分野。然古文文法、時文程式卻皆以「命意布局」為核心，除使用共通文法術語外，時文尚以程式術語具體標明文章結構脈絡，兩者融滲有助於文法精密，尤其可體現論體「析理精微」、「精密圓活」之追求。總之，「理精法密」亦是時文與古文「論體」融通之處。宋代以後，文章評點依然方興未艾，時文與古文之辯證亦爭論不休，在古典散文史上仍有繼續探究空間。

關鍵詞：評點 論體 文法 時文 唐宋古文

從文章評點看南宋時文與 古文「論體」之交涉及其意義 ——以柳宗元〈封建論〉、 徐霖〈太宗治人之本〉為例

蓋琦紓

高雄醫學大學語言與文化中心教授

一、前言

宋代散文成就主要歸功於北宋古文運動，然由歐陽脩（1007-1072）、蘇軾（1037-1101）等人建立優秀古文傳統，若無後人維持、發揚，仍有式微之可能。尤其當策論成為科舉「時文」，^①在北宋中後期已出現不少弊病，如蘇軾曾指出其中流弊：

近世士人纂類經史，綴緝時務，謂之策括。待問條目，搜抉略盡，臨時剽竊，竄易首尾，以眩有司，有司莫能辨也。且其為文也，無規矩準繩，故學之易成，無聲病對偶，故考之難精。^②

① 可參考羅時進、劉鵬：〈唐宋時文考論〉，《文藝理論研究》第4期（2004年），頁63-71。該文對時文源流、演變、界定、特徵等有較具體清楚論述。文中指出從《周禮》出現「時文」一詞，至北宋開始具有文體意義，尤其王安石改革貢舉，「一種『推明義理之學』的新體時文出現」。

② （宋）蘇軾：〈議學校貢舉狀〉，收於（宋）蘇軾著，張志烈、馬德富、周裕鍇主編：《蘇軾全集校注·文集》（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卷25，頁2847。

蘇軾發現當時舉子的策論文字「無規矩準繩」外，且有取巧之弊，連考官亦難以評判。另隨著印刷術發達，官方、私刻時文集、套類等大量出版，^③而場屋之文卻每下愈況。北宋後期唐庚（1070-1120）批評「場屋之間，無復法度」，主張「以古文為法」，「所謂古文，雖不用偶儷，而散語之中，暗有聲調，其步驟馳騁，亦皆有節奏」，^④以為古文具有法度，即使散語仍暗藏聲調節奏，可做為時文之矩矱。其實，自唐宋古文運動以來，古文與時文始終具有辯證關係，兩者看似對立，其實卻又相互融滲；時文弊病愈深，時人愈以古文矯正文風，反而更彰顯古文重要性。

南渡以後，出現前所未見文章「評點」，用以指導學子「如何」閱讀與寫作，^⑤論者以為文章「評點」是古文與時文之間橋樑，促成兩者之間互動、交流。^⑥據筆者觀察南宋文章評點興起及發展大致有兩波：一宋孝宗乾道、淳熙年間，即學者所謂南宋散文中興期，與北宋古文運動遙相呼應，發揚歐陽脩、蘇軾優良古文傳統。^⑦此時呂祖謙（1137-1181）《古文關鍵》結合選本和批點開創嶄新體例，

③ 劉祥光〈宋代時文刊本與考試文化〉一文指出「時文的刊行約自北宋初期即已見。到了中期，這個現象變得更明顯；被刊行的時文多是省試得第者。而到了至少十二世紀初，官方文書顯示，時文刊本已達氾濫的程度。」見劉祥光：〈宋代時文刊本與考試文化〉，《臺大文史哲學報》第15期（2011年11月），頁35-86。

④ 引自（宋）唐庚：〈上蔡司空書〉，《眉山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24冊），卷8，頁367下。

⑤ （宋）呂祖謙：〈總論看文字法〉，《古文關鍵》（臺北：廣文書局，1981年），頁17-18。其中第3「看綱目關鍵」、第4「看警策句法」的兩段文字即出現9次「如何」。以下《古文關鍵》引文均出於此版本，僅隨文附頁數，不另加註。

⑥ 如祝尚書〈時文「以古文為法」的途徑：文章評點〉曰「宋元文章學家們，正是通過包括《古文關鍵》在內的古文評點以及如《止齋論祖》等的時文評點，架起了一座時文通向古文的橋樑」。收於氏著：《宋元文章學》（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71-78。

⑦ 如朱迎平〈南宋散文發展述略〉分成過渡期、中興期、衰落期、終結期，指出「從孝宗隆興初（1163年）至寧宗嘉定末（1224年）約六十年間」，「北宋散文的優良傳統得到全面恢復發揚，南宋散文發展進入了中興期」。收於氏著：《宋文論稿》（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3年），頁171-176。

揭示文章「命意布局之處」，⁸從此古文評點如雨後春筍般興起，如樓昉（1161?-1228?）《崇古文訣》、真德秀（1178-1235）《文章正宗》等；雖然各家編選觀、體例、選文等有所相異，但皆以秦漢以來古文為學習對象，尤其唐宋古文幾乎是各家評點核心。⁹

第二波大致在宋理宗端平、淳祐年間至宋末，程朱理學逐漸定於一尊，¹⁰學者以為南宋散文衰落期。相較前期文章評點視古文為根基，後期則以古文為手段，古文與時文關係愈加緊密，¹¹如謝枋得（1226-1289）《文章軌範》編選體例相當特殊，分成大膽文、小心文，¹²並以「侯王將相有種乎」分卷，提點學子「先暗記侯王兩集，下筆無滯礙」，謝氏以為考生若能熟讀前兩集二十三篇古文，「必雄於文」，可讓考官刮目相看，¹³換言之，以古文指導時文寫作。

又這期間除古文評點外，時文也出現評選本，尤其在宋代「每試必有一論」，

-
- ⁸（清）紀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古文關鍵》（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卷187，頁5116，云：「各標舉其命意布局之處，示學者以門徑，故謂之『關鍵』。」
- ⁹現存呂祖謙《古文關鍵》收錄唐宋8家、62篇，樓昉《崇古文訣》以時代編排，從先秦至宋代，選取48家、192篇，其中唐宋作家32人，165篇。至於真德秀《文章正宗》則建立全新編輯體例，分成四大類：辭命、議論、敘事、詩賦，收錄先秦至唐代詩文，大約1000篇左右。
- ¹⁰梁庚堯：《宋代科舉社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年），頁68，〈第四講官學演變（上）〉：「南宋晚期比較值得注意變化是，從宋寧宗嘉定五年（1212）以後，以朱熹為代表的理學家作品逐漸被採用為大學教材。」
- ¹¹林崗：《明清之際小說評點學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52-67，〈評點的淵源〉指出評點與時文的關係是到了明代八股文才深刻影響評點學。然筆者檢視南宋文章評點，前期評點幾乎未提及場屋之文，但後期不但選評時文，古文評點如《文章軌範》亦為時文寫作服務。
- ¹²（宋）謝枋得批選，（明）李廷機評訓：《文章軌範》（臺北：廣文書局，1970年），卷1，頁17，曰：「大凡學文，初要膽大，終要心小；由麤入細，由俗入雅，由繁入簡，由豪蕩入純粹。」
- ¹³同前註，卷2，頁63及卷3，頁103。有曰：「初學熟此，必雄於文，千萬人場屋中，有司亦當刮目。」「議論精明而斷制，文勢圓活而婉曲；有抑揚、有頓挫、有擒縱，場屋程文論，當用此樣文法。」謝氏巧思安排學文順序，先熟讀前兩卷，再讀第3卷，並明白指出時文寫作可使用的「抑揚」、「頓挫」、「擒縱」古文文法。

較諸他文應用之處為多」，¹⁴作論成為士人之必要條件。晚宋方逢辰《蛟峰批點止齋論祖》（簡稱《止齋論祖》），及魏天應、林子長《批點分格類意句解論學繩尺》（簡稱《論學繩尺》），成為「論體」時文範本，前者評選南宋中期時文大家陳傅良（1137-1203）文章，後者則收錄南渡以來優秀場屋時文，二書皆強調時文取法古文。¹⁵又從早期評點命名「關鍵」、「正宗」至晚期「軌範」、「繩尺」，亦可略見兩者差異，前者揭示文法，或建立古文正統，引導學子閱讀與寫作；而後者則提出文章規範，做為時文寫作遵循準則。

本世紀以來宋代文章學研究頗受學者關注，本文在前人基礎上，從文章評點去探討南宋時文與古文之交涉，並聚焦於「論體」文章；若從《止齋論祖》，《論學繩尺》選文來看，陳傅良時文應是最適合觀察對象，有曰「大凡論出於止齋之手者，文皆精密圓活，得論之體」；¹⁶然學界對南宋中興期古文、時文作家、課題論述已多，¹⁷但似乎較少學者去關注、探討後期時文如何去取法古文。另《論學繩尺》批某些時文曰「古作氣象」、「高古之文」、「出入古文」等，¹⁸其中較明確指出時文源委於古文，乃理宗時期徐霖（1214-1261）〈太宗治人之本〉一文：

¹⁴ （宋）魏天應編選，（宋）林子長箋解：《論學繩尺》（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58冊），頁72上。

¹⁵ 如鄭芳祥：〈時文如何取法古文—以《蛟峰批點止齋論祖》為例〉，《淡江中文學報》第39期（2018年12月），頁70-100，指出「《方批論祖》認為陳氏論體時文從字句到篇章、論證到敘事等各方面學習古文」。另吳建輝〈試論的美學追求〉中指出《論學繩尺》「在評點時將評古文的術語用於評點科考之文，將評古文之法引入評『論』，它與古文選本的評點方法和標準有許多共同之處」，收於氏著：《宋代試論與文學》（長沙：嶽麓書社，2009年），頁157-177。換言之，時文評點強化時文取法古文之具體實踐。

¹⁶ （宋）魏天應編選，（宋）林子長箋解：《論學繩尺》，卷5〈山西諸將孰優〉，批語，頁284下。書中收錄陳傅良時文多達9篇，是篇數最多作者。

¹⁷ 除前文引用朱迎平、祝尚書、吳建輝專著外，又因陳傅良為浙東學人，相關研究如李建軍：《宋代浙東文派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閔澤平：《南宋「浙學」與傳統散文的因革流變》（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4年），皆有專章探討，至於其他單篇論文更不計其數。

¹⁸ 引自（宋）魏天應編選，（宋）林子長箋解：《論學繩尺》，卷1，呂中〈帝王治安之本〉，頁120上；卷6，江萬里〈子儀單騎見虜〉，頁356上；卷9，高應采〈聽言接下之規如何〉，頁513下。

文有古體，語有古意，當於古文求之，其源委得之柳子厚〈封建論〉。¹⁹

據《宋史》本傳記載：

年十三，有志聖人之道，取所作焚之，研精六經之奧，探賾先儒心傳之要。
淳祐四年，試禮部第一。²⁰

徐霖年少即潛心鑽研儒家六經奧義，晚宋周密（1232-1298）曾云「徐霖以《書》學魁南省，全尚性理，時竟趨之，即可以釣致科第功名」，²¹可見其時文符合當時理學思潮外，仍取法唐宋古文。兩宋古文家、道學家向來對道統、文統有所爭議、對立，²²然晚宋時文卻有所融通，值得進一步探討。因此，本文欲從文章評點的選文做深入討論，擬先選取中唐柳宗元（773-819）〈封建論〉、南宋徐霖〈太宗治人之本〉為例，藉分析柳、徐二文，進而探究南宋時文與古文「論體」之交涉及其意義。

二、從古文「論體」至時文「論學」

「論」是中國散文的古老文體，源自於先秦諸子，²³魏朝曹丕（187-226）《典論·論文》提出四科八體，云「書論宜理」；²⁴西晉陸機（261-303）《文賦》曰

¹⁹ 引自（宋）魏天應編選，（宋）林子長箋解：《論學繩尺》，卷1，頁122下。後文討論〈太宗治人之本〉皆出自此，不再加註。

²⁰ （元）脫脫等：《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卷425〈徐霖本傳〉，頁12678。

²¹ （宋）周密：《癸辛雜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40冊），後集，「太學文變」。

²² 參見何寄澎：《北宋的古文運動》（臺北：幼獅文化公司，1992年），附論2〈古文家與理學家之交涉〉，頁451-484。

²³ （宋）吳子良：〈文章緣起〉，《荊溪林下偶談》（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481冊），卷2，頁495下。「按『論』之名起於秦漢以前，荀子〈禮論〉、〈樂論〉，莊子〈齊物論〉、慎到〈十二論〉、呂不韋〈八覽〉、〈六論〉是也。」

²⁴ （魏）曹丕：《典論·論文》（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1。

「論精微而朗暢」，²⁵東晉李充〈翰林論〉曰「論貴於允理，不求支離」，²⁶南朝蕭統（501-531）《文選》序文亦曰「論則析理精微」，²⁷可見「析理」是論體本色。

至於劉勰（465？-522？）《文心雕龍》則有較完整說明：

論也者，彌綸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原夫論之為體，所以辨正然否；窮於有數，迫於無形；迹（鑽）堅求通，鈎深取極；乃百慮之筌蹄，萬事之權衡也。故其義貴圓通，辭忌枝碎，必使心與理合，彌縫莫見其隙；辭共心密，敵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是以論如析薪，貴能破理。

劉氏在前人基礎上，更深入說明論體之理與辭。作論是為了明辨是非，須經過深入思考，從具體現象（有數）推求背後隱藏的道理（無形），方能「析理精微」，以權衡萬事之是非。²⁸至於論之文辭，前人言及「朗暢」、「不求支離」，劉氏進一步說明因論體「義貴圓通」，故「辭忌枝碎」，須使邏輯精密，讀之令人信服。最後劉氏贊曰「理形於言，敘理成論。詞深入天，致遠方寸」，²⁹總而言之，一篇論體文章若能兼具「破理」、「詞深」，將能影響深遠。

至唐宋古文運動主張文以明道、貫道，強調文與道合，儒道復興，文章講求

²⁵（晉）陸機著，張少康集釋：《文賦集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頁99。柯慶明〈「論」、「說」作為文學類型之美感特質〉云「從陸機看來，『論』的特質，就『意』而言是『精微』，就『辭』而言是『朗暢』」，「深入淺出，以明白曉暢的話語，表達深奧微妙的道理，才是陸機心目中，關於『論』的文體要求」，收於氏著：《古典中國實用文類美學》（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7年），頁13-57。

²⁶（晉）李充：〈翰林論〉，收於（清）嚴可均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晉文》（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卷53，頁1767。

²⁷（梁）蕭統著，（唐）李善注：《文選》（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年），序文，頁1。

²⁸參見褚斌杰：《中國古代文體概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論說文〉，頁335。

²⁹（梁）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臺北：學海出版社，1991年），卷4〈論說〉，頁326-329。

經世致用，也愈發重視議論，如呂祖謙曰「有用文字，議論文字是也」（頁18）。明人吳訥指出論有二類：「史論」、「論」，前者係「史臣於傳末作論議」，後者則為「學士大夫議論古今時世人物，或評經史之言」，即文人廣泛運用體裁；而吳氏最推崇韓愈、歐陽脩作論「辭精義粹、卓然名世者」，從六朝「精微」，至唐宋「精粹」，皆以「精」為論體要求。^{③⑩}

另「論」在唐、宋尚成為考試文體之一，誠如前述，作論為宋代士人之必要條件，故論體寫作逐漸專業化、技術化，再加上評點推波助瀾，^{③⑪}「論學」於是產生。晚宋《論學繩尺》即是一部類似唐代詩格之著作，以文格分類，書中收錄優秀場屋之論一百五十六篇，作者多達一百三十人。^{③⑫}卷首〈行文要法〉集錄十二位時文專家作論法，涉及論體文章各層面寫作原則、技巧。其中古文文法、時文程式可以說是「論學」形成之重要推手，如戴溪云「據古文為文法」，時文寫作汲取古文文法，可謂當時論體高手之要訣。

首先，從《古文關鍵·看古文要法》及《論學繩尺·諸先輩論行文法》二書中相似文字，^{③⑬}觀察時文欲取法古文之處：

^{③⑩} （明）吳訥等：《文體序說三種》（臺北：大安出版社，1998年），頁53-54。柯慶明：〈「論」、「說」作為文學類型之美感特質〉，頁18，曾以《莊子·知北游》「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莊子·秋水》所謂「夫精，小之微也」討論論體「析理精微」。至於韓愈、歐陽脩論體「辭精義粹」，筆者較傾向以《周易·乾》「剛健中正，純粹精也」來闡釋唐宋古文家追求儒道之純粹。

^{③⑪} 楊玉成：〈閱讀與規訓：南宋科舉評點與印刷文化〉，「傳統中國的社會生活與文化研討會」論文（南投：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系、中國語文學系，2007年1月7-8日），頁1-60，以為「評點建構出一種技術系統，時文只有透過這些技術才成為一種嚴格的建制。」

^{③⑫} 張海鷗、吳承學、彭玉平：〈《論學繩尺》與南宋論體文及南宋論學〉，《宋代文章學與文體型態研究》（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18年），頁97，指出該書「基本上是南宋100多年科場『元、魁、進士』的試卷總集，其指導科考權威性、實用性可謂獨一無二。」

^{③⑬} 二文分別冠於《古文關鍵》、《論學繩尺》之書首。

古文關鍵	論學繩尺
如何是主意，首尾相應。 有一脈過接乎其間，然後可。無形者血脈也。	看論須先看主意，然後看過接處。 作論要首尾相應，及過處有血脈。
如何是繳結有力處	論之繳結處，須要著些精神，要斬截。
轉換有力	論之轉換處，須是有力
筆健而不粗，意深而不晦，句新而不怪，語新而不狂。常中有變，正中有奇。題常則意新，意常則語新。	題常則意新，意常則語新。意深而不晦，句新而不怪。筆健而不粗，語新而不常。

呂祖謙將六朝以來講求謀篇布局標舉為文章之「關鍵」，進而綱舉目張，從「首尾相應」、「鋪敘次第」到「抑揚開合」（頁17），即從整體到局部、宏觀到微觀，更細致分析結構脈絡，³⁴故著眼於「過接處」，並以無形的「血脈」喻之。

《論學繩尺》節錄這些文字，即提醒學子作「論」須學習古文文法，著重「主意」、「首尾相應」、「過接」、「血脈」、「轉換有力」、「繳結」等結構脈絡外，及作文的題、意、語（句）的常及新，所謂「常中有變，正中有奇」，即不拘於法度，講求靈活變化。

其次，呂祖謙同期的科舉名人陳傅良，「其為文出人意表，自成一家，人相與傳誦，歲從游者常數百人」，³⁵宋末狀元方逢辰批點《止齋論祖》，推重傅良時文為論之祖，以為其「論」體文章在南宋具宗師地位。該書卷首所附〈止齋論訣〉，亦收錄於《論學繩尺》，為傅良教導學子寫作「論體」八大訣竅：「認題」、「立意」、「造語」、「破題」、「原題」、「講題」、「使證」、「結尾」八項，³⁶前三項是說明作論三大原則，後五項著重於試論的程式。時文為命題

³⁴ 可參見蓋琦紓：〈南宋古文評點的「關鍵」、「文法」與「文勢」之分析——以《古文關鍵》、《崇古文訣》為中心〉，《淡江中文學報》第38期（2018年6月），頁81-112。一文指出呂祖謙上承六朝以來結構、布置說外，進而揭示文章脈絡，強調文意相應、聯繫、往復的關係；又將其標舉為文章最緊要之處，即所謂「關鍵」。

³⁵ 引自（宋）蔡幼學撰：〈行狀〉，收於（宋）陳傅良：《止齋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50冊），附錄，頁924上。

³⁶ （宋）陳傅良撰，（宋）方逢辰批點：《論訣》，《蛟峰批點止齋論祖》（臺南：莊嚴文化，1997年，《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明成化六年朱暄嚴陵郡齋刻本），頁4-6。以下〈止齋論訣〉引文均出自此版本，僅隨文附標題，不另加註。

作文，審題立意是前提，文章鋪陳皆自此前提開展，而逐漸形成一套程式，這應是時文與古文之重要分野。陳氏提出試論程式及作法外，其文章又足以成為範文，故當時學子趨之若鶩。另馮椅以動物為喻，所謂鼠頭、豕項、牛腹、蜂尾，或歐陽起鳴以人體為喻：論頭、論項、論心、論腹、論腰至論尾，無論分成或四、或五、或六部分，其實皆是將古文文法的「命意布局」，即文章結構布置更具體化、形象化。

再其次，六朝劉勰以為論體「義貴圓通」，南宋呂祖謙亦云「論不要似義方，要活法圓轉」，論體追求「圓」，幾乎為各家共識，如陳傅良言論體造語有三，第一即是「圓轉周旋」；吳鎰指出論體有七，第一亦是「圓轉」；李先生則比較策、論，「策文方，論文圓」；而歐陽起鳴〈論評〉云「論似卵，卵本圓，故論亦要圓，圓則有首尾」，即前述「首尾相應」，並進而以卵的構造說明之：

予謂命題似黃，立意似清，行文似幕，造語似殼。意要包題，文要涵意，語要藏文，故黃在清裏，清在幕裏，幕在殼裏。⁶⁷

時文為命題作文，「命題」如蛋黃，居於核心，「黃本濁，濁則不冷淡」，命題不宜一目瞭然，須有意味；而「立意」則如蛋清，包裹著「命題」，且「清本清，故意亦要清，清則不混雜」，立意要明白。審題立意穩當之後，接著「行文」就如同蛋膜，「幕薄而微見其清，故文亦要薄而微見其意」，所謂「文要涵意」，行文含蓄不露骨；最後造語如蛋殼，「殼硬而外護其幕，故語亦要雄健，而外護其文」，主張造語雄健，而雄健向來是古文之審美追求。總之，歐陽起鳴以雞蛋之結構為喻，注重文章之命意布置，即呂祖謙所揭示古文之「關鍵」，並追求「活法圓轉」，換言之，古文、時文之文法相通，且以活法為依歸。

此外，尚可從《論學繩尺》中「深得論體」批語之文章，觀察這些論體範文之特色：

⁶⁷ 正文所引述呂祖謙、吳鎰、李先生、歐陽起鳴等人說法，皆出自（宋）魏天應編選，（宋）林子長箋解：〈諸先輩論行文法〉，《論學繩尺》，78上-79下。

格製	作者	題目	總批
推原本文	戴慶炯	漢訓辭深厚如何 (卷1, 頁102下)	主意純正, 文筆駿發, 深得前輩論體。人批此篇下得言語最好。
就題生意	吳君擢	唐虞三代純懿如何 (卷2, 頁126下)	文字出入東萊議論, 法度嚴密, 意味深長, 說得聖人本心出, 深得論體, 可敬可服。
駁難本題	蔡 岸	博施濟眾何如 (卷2, 頁164下)	深得論體, 此篇是要看他閒字, 回幹冷語, 發明最有法度。
就題發明	錢易直	君人致帝者之用 (卷5, 頁277下)	深得論體。
就題發明	朱 埴	君人致用成化如何 (卷5, 頁281上)	於題字有分別, 亦有發越, 義廣意深, 語圓筆老, 深得論體。
發明題意	馮 椅	仁聖博施濟眾 (卷6, 頁336下)	文勢圓轉, 節節相應, 深得論體。
評品優劣	易 袞	蕭曹丙魏孰優 (卷6, 頁367上)	議論當理, 文字圓熟, 終篇反復抑揚, 婉曲不直致, 判斷到優劣處, 又含蓄不明言, 褒貶之意自見, 深得論體。
順題發明	戴慶煇	王者之論如何 (卷8, 頁451下)	立意高, 行文老, 步步照應, 如珠走盤, 深得論體。
形容題意	陳傳良	舜禹有天下而不與 (卷8, 頁474下)	議論出人意表, 行文精微通暢, 深得論體。
題外生意	沈震孫	大漢典籍著作如何 (卷9, 頁525下)	意味長, 詞藻粲, 深得論體。

《論學繩尺》以文格分類, 而「這些格名本身就表明審題立意作文方法」,³³誠如前述, 時文為命題作文, 「審題立意」是前提, 該書以此分類立格, 有助於學子考生掌握「審題立意」訣竅。另這些「深得論體」篇章深具立意、造語特色, 前者如主意純正、立意高、意味長, 義廣意深, 後者如語圓筆老、文字圓熟、詞藻粲; 而整體風格, 包括「文筆駿發」、「文勢圓轉」等。這些時文佳作「議論當理」、「法度嚴密」、「步步照應」、「行文精微通暢」, 除符合「論體」理與

³³ 張海鷗等:《宋代文章學與文體型態研究》, 頁100。統計該書格製共86格, 去其重覆, 實有54格, 以為「每個格名所標示的, 都是在審題基礎上立意的角度和謀篇布局之法。」

辭要求外，又從古文評點所揭示文章「關鍵」，學習文法，促使「論體」寫作技術化、專業化，「論學」於是產生。

從上述可知，自「論體」至「論學」的發展，古文文法、時文程式逐漸相互融滲，促使宋、元期間作「論」成為專門學問。呂祖謙曾教人作文「讀秦、漢、韓、柳、歐、曾文字，以養根本」、「時文近試半年旋看可也」，³⁹讀古文厚養根本，考試前半年才快速讀時文，南宋中期以前大致如此。然南宋後期，學子多提早學習時文，甚至自幼即開始，⁴⁰雖不免有本末倒置之嫌，卻也反映晚宋時文寫作專業化。

三、從宋人視野下見柳宗元〈封建論〉之得失

前文從評點文論去探討「論體」、「論學」，以下則進一步從具體選文去討論、印證，擬先分析柳宗元〈封建論〉，討論宋人如何看待該文，及柳文何以做為歷代士人學習、仿效對象。柳子〈封建論〉是一篇著名政論文，後人以爲可與西漢賈誼〈過秦論〉並稱。⁴¹其實，宋初李昉（925-996）等人編纂《文苑英華》尚未注意該文，但自姚鉉（967-1020）《唐文粹》選入後，南宋呂祖謙《古文關鍵》、樓昉《崇古文訣》、真德秀《文章正宗》又加以選評之，於是〈封建論〉自然成為南宋士人熟讀範文。且宋代以後，明清多家古文選本亦收錄該文，⁴²促使

³⁹ 呂祖謙：〈與內弟曾德寬〉，《東萊呂太史集·別集》，收於（宋）呂祖謙著，黃靈庚、吳戰壘主編：《呂祖謙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卷10，頁502。

⁴⁰ 可參見劉祥光：〈宋代時文刊本與考試文化〉，頁75-78。該文指出「南宋後期，不少讀書人似乎認為要提早讓學生讀時文，時文的重要性又再高一層。閱讀時文的年齡因而提早」，學子閱讀時文、儒典優先順序相差不遠，「這種轉變可能是北宋甚至南宋中期的士大夫未曾想過的結果」。

⁴¹ 如（清）林紓：《韓柳文研究法》（臺北：廣文書局，1980年），頁71。稱譽「〈封建〉一文為古今至文，直與〈過秦〉抗席。」

⁴² 據王基倫〈柳文之體類區分及其意義〉一文統計〈封建論〉在宋明清12家古文選本中有9家選取，是柳宗元「論辨類」中最多選本收錄的文章，參見氏著：《韓柳古文新論》（臺北：里仁書局，1996年），頁92。

〈封建論〉經典化。

唐代在安史之亂後，面對日趨嚴重的藩鎮問題，可以說是柳宗元撰寫〈封建論〉的現實背景。該文長達一千七百餘字，規模宏大，大致可分成四個部分：首先，闡述封建制之起源及形成，作者以「勢」立論：

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⁴³

柳子以為古聖王所以採用封建制乃是外在形勢造成的，該文從生民之初，「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類「必將假物以為用者」，「假物者必爭」，進而論及「君長刑政生焉」，「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封建制於是形成，故以為「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

其次，徧舉周、秦、漢、唐之制，分析其利弊得失，從「周有天下，列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陵夷迄於幽、平，王室東遷，而自列為諸侯矣」，柳子直指「余以為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可謂一語道破，呂氏批「語好」。宗元反對周朝封建制，卻推崇秦制之優點：

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為之郡邑，廢侯衛而為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為得也。

秦皇一統天下，建立郡邑制，「攝制四海」；雖「不數載而天下大壞」，然「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以為「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秦之短祚在於上位者不仁，並非制度有錯。至於「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漢室矯正秦之缺失，恢復周朝封建制，諸侯國、郡邑各佔一半，

⁴³ (唐)柳宗元：〈封建論〉，《柳宗元集》（臺北：華正書局，1990年），卷3，頁69-75。以下〈封建論〉引文皆出自該版本，不再註明出處。

造就「陵遲不救者三代」，「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柳子藉此反證秦制之長。到了唐代：

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為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

兼採封建、郡邑制，從秦朝「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漢代「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至唐朝「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指出有叛人、叛國、叛將，卻無叛吏、叛郡、叛州，藉此一而再、再而三強化郡邑制之優點，也間接批判唐代藩鎮割據的現象。

又其次，作者另提出三辨，以駁斥前人說法。第一辨：

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

宗元以周朝「亂國多，理國寡」，「失在於制，不在於政」；秦朝則「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失在于政，不在于制」；至於「漢興，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儘管侯王亂、國人病，但「郡邑可謂理且安」。而唐代「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只要能「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總之，作者仍徧舉周、秦、漢、唐之事跡，極言封建之害民，郡邑守宰之治平。緊接第二辨，「或者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宗元則舉魏、晉沿襲漢代，仍建封爵，卻陵替短祚。而今唐矯變之，大業則「垂兩百年」。

而第三辨：「或者又以為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宗元指出殷、周所以不廢前人封建制是迫不得已，其云：

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

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己也，私其衛于子孫也。

宗元以爲商湯、周武王爲安撫前朝諸侯之歸附，不得不因循舊制外，且大膽指出湯、武之「不得已」非出於大公，而是出於私心，所謂「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衛於子孫也」；而秦制「公之大者也」，但「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于我也」，呼應前述上位者不仁，而非郡邑制之失，並歸結「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前未所聞，足以震撼世人。

該文結尾提出天下之道須「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即所謂「用人唯賢」，仍體現儒家治道思想。因封建者「繼世而理」，無法保障賢者必居上位，下位者亦未必不肖；且諸侯「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即使聖賢出現，亦無法立足於天下。因此，作者以封建制「非聖人之意也，勢也」作結，呼應首段「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

封建、郡邑（縣）制之辨一直是中國古代士人爭論不休的政治議題，北宋蘇軾曰：

昔之論封建者，曹元首、陸機、劉頌，及唐太宗時魏徵、李百藥、顏師古，其後有劉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論出，而諸子之論廢矣，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

從魏晉至唐代討論封建篇章不少，蘇軾以爲柳宗元〈封建論〉一出，諸家之說幾廢，其認同柳文之觀點，云「聖人不能爲時，亦不失時。時非聖人之所能爲也，能不失時而已」，以時言勢，其意與柳文相通；又云「始皇既并天下，分郡邑，置守宰，理固當然」、「世特以成敗爲是非耳」，以支持柳子「公天下之端自秦始」；最後曰「凡有血氣必爭，爭必以利，利莫大於封建。封建者，爭之端而亂之始也」，直指封建制爲歷史上篡弑禍害之亂源，故以爲「李斯、始皇之言，柳宗元之論，當爲萬世法也」。⁴⁴

⁴⁴ （宋）蘇軾：《東坡志林》（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卷5，頁103-104，「秦廢封建」。

雖然柳文面世以後，掩蓋前人之說，卻又引發後人更多爭議，如南、北宋之際胡寅（1098-1156）即以「封建與天下共其利，天道之公也；郡縣以天下奉一人，人欲之私也」立說，並一一駁斥柳文之論點，略舉如下：

是堯舜共為此法，以公天下。而宗元以為不得已之勢，誤矣。

夫為其德之不可忘，是以憫其絕止，仁之至，義之盡，不以為聖人之意，而歸之勢，可乎？

論成敗而不循其本源，猶治心疾而歸於手足之辟戾。

宗元又以封建為失制而非失政，秦失政而非失制。是未悟制即政，政即制也。

若此類，宗元皆略而不講，乃摘取衰微禍亂之一二，欲舉封建而廢之，是猶見刖者而欲廢天下之屨也。⁴⁵

胡氏反對柳文的聖人「不得已之勢」說，以為聖人乃以仁義之心分封諸侯；對柳子論述歷代得失成敗，胡氏則批判其舉例以偏概全，又將治政、制度分開，未知二者密不可分。總之，胡文完全從駁斥柳文之論點立說，真德秀以為「胡氏之論皆足以破柳子之失」。⁴⁶

又南宋理學家幾乎全面撻伐柳文，如朱熹（1130-1200）雖云「封建實是不可行」，⁴⁷但仍抨擊柳文：

且封建自古便有，聖人但因自然之理勢而封之，乃見聖人之公心。且如周

⁴⁵ 該文附於（宋）真德秀：《文章正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55冊），〈封建論〉之後，頁381下-382上。

⁴⁶ 同前註，頁382上。

⁴⁷ （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卷108，頁2679-2680。「論治道」曰「封建後來自有尾大不掉之勢。成周盛時，能得幾時！到春秋列國強盛，周之勢亦浸微矣」，「封建井田，乃聖王之制，公天下之法，豈敢以為不然！但在今日恐難下手。」

封康叔之類，亦是古有此制。因其有功、有德、有親，當封而封之，却不是聖人有不得已處。若如子厚所說，乃是聖人欲吞之而不可得，乃無可奈何而為此，不知所謂勢者，乃自然之理勢，非不得已之勢也。⁴⁸

朱子批判柳文在於對聖人之質疑，其以封建制基於「自然之理勢」，流露「聖人之公心」，以駁斥柳文「不得已之勢」。另呂祖謙、樓昉、真德秀三人皆評選〈封建論〉一文，但亦不認同其論點：

以封建為不得已，以秦為公天下之制，皆非正論。所以引周之失、秦之得，證佐甚詳，然皆有說以破之。但文字絕好，所謂強辭奪正理。（樓昉）
此篇間架宏闊，辨論雄俊，真可為作文之法，然其理則有未然者。（真德秀）⁴⁹

樓昉雖賞愛其「文字絕好」，卻也反對柳文的聖人「不得已」、「以秦為公」之說，以為「皆非正論」、「強辭奪正理」。而真德秀推崇該文「真可為作文之法」，但仍批曰「其理則有未然者」，又如呂祖謙總評僅曰：「此是鋪敘間架法」（頁77），然於柳文中「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湯、武之所不得已也」，旁批「用事好，但理不如此」（頁78）。由此可知，南宋理學家多非難柳文的聖人不得已之說，更無法苟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暴秦又何能以私心建立公制？⁵⁰總

⁴⁸ （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卷139，頁3303，「論文上」。

⁴⁹ （宋）樓昉：《迂齋先生標註崇古文訣》（元刊巾箱本），卷12，「古籍與特藏文獻資源」（<http://rbook.ncl.edu.tw/NCLSearch/Search/Index/1>）（檢索日期：2021年2月1日。）（宋）真德秀：《文章正宗》，頁381上。

⁵⁰ 誠如王德權〈「士人入仕」的再詮釋—柳宗元「封建論」的一個側面〉所言：「以〈封建論〉而言，『封建，非聖人意』的提法雖可能衝擊傳統觀點，嚴格地說，並未撼動儒家的核心價值。讓宋人感到不安的地方，或許是始皇以一己之私卻成就天下之公，這個論點意味著道德上不善的動機，卻可能成就現實上善的後果，對重道德心性的宋代士大夫來說無異洪水猛獸。」見王德權：〈「士人入仕」的再詮釋—柳宗元「封建論」的一個側面〉，《漢學研究》第26卷第2期（2008年6月），頁71-100。

之，向來「尊聖」的宋代士人即使主張郡縣制亦多批判柳文。⁵¹

雖然如此，南宋文章評點家卻又幾乎選評〈封建論〉，並稱許其文章間架、辨論文字，甚至連真德秀《文章正宗》「以明義理、切世用為主」為選文標準，⁵²亦稱該文「真可為作文之法」。呂祖謙「看柳文法」有云「當學他好處，當戒他雄辯，議論文字亦反覆」（頁19），提醒士人可學習柳文「議論文字反覆」的優點，但仍須留意其雄辯、理未正之缺失，從〈封建論〉或可略窺一二。

四、徐霖〈太宗治人之本〉之法古與新意

南宋後期時文〈太宗治人之本〉命題出自於《新唐書·循吏傳序》引唐太宗（598-649）話語中「惟治人之本莫重刺史」，⁵³唐太宗治理天下，重視刺史之職，誠如柳子論及唐代「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為宜也」，故徐霖作該文取法柳文，其來有自。前文論及南宋理學家頗不認同柳子〈封建論〉中聖人不得已之說，而徐霖處於程朱理學盛行時期，⁵⁴其文如何自〈封建論〉脫胎而出？又有何新意？如何跳脫時人對柳文爭議，而成為一篇融通古文之佳作。

⁵¹ 李宗翰〈馬端臨之封建論與郡縣國家觀〉一文中，從元初馬端臨《文獻通考·封建考》分析南宋時期的封建論述，指出南宋人主張恢復封建的言論僅屬少數。見李宗翰：〈馬端臨之封建論與郡縣國家觀〉，《新史學》第22卷第4期（2011年12月），頁5-53。換言之，維持郡縣制仍佔大多數，但除蘇軾支持柳文，其他如正文所云多是反對聲音。

⁵² （宋）真德秀《文章正宗·綱目》曰：「今行於世者，惟梁昭明《文選》、姚鉉《文粹》而已。繇今視之二書所錄，果皆得源流之正乎？夫士之於學所以窮理而致用也，文雖學之事要亦不外乎此」，可知真氏以理學家角度選文。見（宋）真德秀：《文章正宗》，頁5上。

⁵³ （宋）歐陽脩、宋祁等合撰：《新唐書·循吏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卷197，頁5616。序文：「唐興，承隋亂離，剷祓荒荼，始擇用州刺史、縣令，太宗嘗曰：『朕思天下事，丙夜不安枕，永惟治人之本，莫重刺史，故錄姓名於屏風，卧興對之，得才否狀，輒疏下方，以擬廢置。』」

⁵⁴ （元）脫脫等：《宋史·理宗本紀》，卷45，頁889。贊曰「自帝繼統，首黜王安石孔廟從祀，升濂、洛九儒，表章朱熹《四書》，丕變士習」，「後世有以理學復古帝王之治者，考論匡直輔翼之功，實自帝始焉」可知宋理宗扶植程朱理學不遺餘力。

（一）柳、徐二文皆以「勢」立論

誠如前述柳子〈封建論〉以爲古代聖王所以分封諸侯，「非聖人之意也，勢也」，換言之，封建制是當時形勢造就的。文中闡述封建制之起源及形成，從生民之初，「草木榛榛，鹿豕狉狉」，演變至「君長刑政生焉」。至於徐霖〈太宗治人之本〉則從「王者之設官」、「王臣之位」，有別於諸侯之職，藉此強調建諸侯之必要，以爲「天下之勢」，誠如《論學繩尺》批云「此議論自柳子厚〈封建論〉中來，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

另徐文尚仿效〈封建論〉「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其曰：

生民之初，糾糾紛紛、五合六聚，奉其尤能者，而爲之君，此一人者，豈能以其方寸之智慮而把握之哉？彼天地奠位、山川脩阻、表裏區分如星羅而綦布者，固自然之勢、經久之基，林林然、黎元赤子之命所根也。

作者精簡柳文中述封建制之形成，掌握所謂「自然之勢」，值得注意的是徐文悄悄增加「經久之基」一句，而能別於柳文觀點，開展新的論述。

（二）徐文從「勢」推及「本」、「仁」

前文提及時文爲命題作文，須以審題立意爲前提，徐文即準確掌握「認題」關鍵，從「題中要緊字」立意，即在「本」字上著工夫，故《論學繩尺》將該文立爲「就題摘字格，歸重在本字上」。徐文首段言及「古之聖王不計其勢之廣也，思夫天下之勢，自有根本者存」，其「分土地而設司牧，使之各制其國，而各子其民，以植立大勢之根本」，從「勢」論及「根本」，以爲如此聖人方能德孚眾望，「徧致其仁愛斯民之意」，而此亦是「古者建諸侯之意」。此番議論不同於柳文所云「封建，非聖人之意也」，而是偏於朱熹「自然之理勢」。

其次，柳文貶抑封建制，推崇郡邑制，兩者對峙；而徐文卻將刺史與古諸侯之職相舉，強調「夫刺史者、古諸侯之職也，大勢植立之本也」，作者以爲唐太

宗深思治人之本在於刺史之職，藉此體現其「深根固蒂之仁」。本文至此立說已定，後文則反覆論述「勢」、「本」、「仁」，如下云：

天下之勢必有本，植其本則固而安；蹶其本則散而擾，此所以古諸侯之職與夫聖人封建之法為天下後世慨嘆而不可復也。

聖人因其勢而有諸侯分治之法，以寄吾仁民愛物不能徧及之心。

相對於柳子強力批判分封制之缺失，徐文則著重聖人仁民愛物之心，而此正是「古者建諸侯之意」。

（三）人物論評

徐文可以說是一篇評論唐太宗文章，太宗「貞觀之治」向來為人所津津樂道，甚至以夏商周三代治政相喻，如《新唐書·太宗本紀》贊曰「其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漢以來未之有也」。⁵⁵雖然如此，宋人對唐太宗仍頗有微詞，尤其理學家批判最為嚴厲，如北宋程頤（1033-1107）即曰「如貞觀、開元間，雖號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風，三綱不正，無父子君臣夫婦，其原始於太宗也」⁵⁶；南宋朱熹則批評太宗「假公義以濟私欲」，⁵⁷更全盤否定「貞觀之治」。⁵⁸

而徐霖身處程朱理學定於一尊時期，又如何應答「太宗治人之本」命題？其實，徐文評論太宗是褒多於貶，如云「唐之太宗識之，深思極慮，惻然念治人之

⁵⁵ （宋）歐陽脩、宋祁等合撰：《新唐書·太宗本紀》，卷2，頁480。

⁵⁶ （宋）程頤、程頤：《二程集·河南程氏遺書》（臺北：漢京文化公司，1983年），卷18，頁236。

⁵⁷ （宋）朱熹：《朱子語類》，卷136，頁3245-3246，「歷代三」。

⁵⁸ 方震華〈唐宋政治論述中的貞觀之政—治國典範的論辯〉論及「南宋時期，唐太宗的典範因與恢復中原的理想相吻合，再度受到統治階層的重視。相對地，朱熹等理學家則再度嘗試重建三代的文化秩序」，「以求確立『堯舜三代』作為唯一治國典範的地位。」作者指出南宋統治者重視唐太宗治國典範，但理學家只推崇堯舜三代。方震華：〈唐宋政治論述中的貞觀之政—治國典範的論辯〉，《臺大歷史學報》第40期（2007年12月），頁19-55。

本而歸重於刺史之職」；「以英雄超邁之姿，平定海內，思爲生民悠遠之計」，誠如前述，全文反覆強調太宗深得「古者建諸侯之意」、聖人仁民愛物之心，讚嘆「帝惟識其勢而植其本，以基唐家一代之仁，此所以爲唐之太宗也歟！」並以爲太宗之後，玄宗「開元之治」，曾「作〈令長新戒〉一篇賜天下縣令，是亦太宗重本之意也」。雖然如此，徐文仍在理學思潮背景下，提出：

純仁以治心者，此又本之上也，而先王自強不息，謹終如始，絕人欲、維天理之意也。

強調「此心之仁，純明粹精」，不可受一絲蒙蔽，進而批評太宗所謂「本者特其輔耳」，以刺史爲治人之本，只是仁心之輔佐；感慨「此三代之仁也，太宗猶假之而未至，則吾於他奚責焉？」，雖太宗未達三代之仁，但作者仍「獨喜夫太宗之所謂本者，爲深識夫三代扶持植立之意也」，肯定太宗能領會古聖王「仁愛斯民之意」，做爲本文結尾，亦呼應破題「英主之仁天下也，其求夫植立之要，此其慮深遠矣」。

綜合上述，徐霖〈太宗治人之本〉之立意，誠如《論學繩尺》說明：「刺史之職乃天下大勢、植立之本，太宗之治天下而歸重於刺史，乃深根固蒂之仁也」，其以「天下大勢」立論源自柳子〈封建論〉，但文章重心更在於「根本」、「仁心」，體現其追求聖人之心。換言之，徐文雖脫胎於柳文，但也反映「絕人欲、維天理」理學思潮，自然跳脫時人對柳文爭議。

此外，南宋時文已嘗試採取「代聖賢立言」的言說方式，可以說是在理學追求「聖人之心」的思潮下形成的。⁵⁹如徐文中云「聖人因其勢而有諸侯分治之法，以寄吾仁民愛物不能徧及之心」、「吾仁遂已」，即以第一人稱代聖人表達「仁心」。儘管如此，其論述仍多出自己意，如前述徐子肯定及批評唐太宗之處，另

⁵⁹ 引自楊玉成：〈閱讀與規訓：南宋科舉評點與印刷文化〉，頁48-49。該文論及「《論學繩尺》這類代言已相當普遍」，「代言製造一種認同的幻覺，考生沉浸在聖賢世界，用戲劇性的方式加以表演，這是一種感動考官的策略，可以想像考官評閱時也會重溫經典的感動，科舉於是變成一種認同的集體儀式。」

批判唐玄宗晚節末路，「使太宗所植立、所綱維者披裂敝壞，而生民不得以仁遂矣」，當指安史之亂促使唐朝由盛轉衰。總之，徐霖〈太宗治人之本〉雖是科舉時文，亦是一篇「議論古今時世人物」的論體文章。

五、時文之精即古文之理

前文主要討論徐霖〈太宗治人之本〉源委於柳文之處，及如何開展新意。本節擬從二文評點批語（旁批）進一步去分析文法、程式，⁶⁰闡述時文與古文「論體」融通之處。今檢視〈封建論〉在《古文關鍵》、《崇古文訣》、《文章正宗》三書批語，⁶¹其中《文章正宗》僅有總評，前文已討論；《崇古文訣》則有少數批語沿用《古文關鍵》，以下表列此二書旁批，樓書重複呂書批語則不列入。

原文	古文關鍵	崇古文訣
天地果無初乎？……故封建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婉。 起伏。 結一段意。 封建本意。 密。	不取封建。 應勢不可一句。 直推向前去。 此等議論自不可破。
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	結周。 語好。	歷數封建之失，蓋其意不喜此制。 精神。 言州與郡不叛，州縣之利可知。

（續下表）

⁶⁰ 多數評點書籍有旁批、夾批，其中夾批小字雙行，或標音讀，或注釋，與文法無關。而旁批小字單行，多涉及章法、句法，故本文僅取旁批。

⁶¹ 除這三家選評〈封建論〉外，尚有（宋）王震震：《古文集成前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59冊），頁1下。四庫提要指出編者王震震不知何許人，該書或為「南宋書肆本」；「原本於呂祖謙之《古文關鍵》、真德秀之《文章正宗》、樓昉之《迂齋古文標註》，一圖一點無不具載」，可知書中彙集前人評語。據筆者檢視僅有兩三處批語不同於呂、樓二家，因篇幅有限，暫不討論王書。

原文	古文關鍵	崇古文訣
或者曰……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	難。 應。 間架。 上四句下三句結得用事法。 間架。 再難。 又難。 用事好，但理不如此。 承得好。	此固郡縣之得，然失亦在此。只因漢有許多不好事，故子厚得以爲辭。 應前封建非聖人意也一句。皆是強辭初非正理，然就其說中，可謂警策矣。 從不得已三字綴下來。十分取之，有激之論。
夫天下之道，理安。……非聖人之意，勢也。	罪封建。	

呂氏〈總論看文字法〉曾揭示閱讀古文具體步驟：

第一看大概主張。

第二看文勢規模。

第三看綱目關鍵：如何是主意首尾相應，如何是一篇鋪敘次第，如何是抑揚開合處。

第四看警策句法：如何是一篇警策，如何是下句下字有力處，如何是起頭換頭佳處，如何是繳結有力處，如何是融化屈折翦截有力處，如何是實體貼題目處。（頁 17-18）

從表列二家批語來看，其中「封建本意」、「罪封建」、「不取封建」、「歷數封建之失」、「此固郡縣之得，然失亦在此」等可謂該文「大概主張」。呂氏總批「此是鋪敘間架法」，應指「文勢規模」；⁶²旁批且出現兩次「間架」：

⁶² 呂祖謙尚使用「|」符號分解該文十五小段，又以「|」標誌在某些小段開頭（二三字）大致有九處，及重要尾句或句子，亦藉此提示文意、文句呼應。參考仇小屏之解析，見氏著：《呂祖謙〈古文關鍵〉文章論研究》（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0年），頁 241。

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間架）

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間架）

宗元舉例周朝、漢代實行封建制之缺失，以反駁他人對郡邑制之質疑，呂氏提示其布置作法。另起、承、應等批語，則進一步揭示「關鍵綱目之處」，即文章前後照應之脈絡。

至於指出警策句法之處：

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觀汲黯之簡靜，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臥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呂批：上四句下三句結得用事法。）

蓋以諸侯之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呂批：用事好，但理不如此。樓批：皆是強辭初非正理，然就其說中，可謂警策矣。）

前者組合漢文帝恢復孟舒、魏尚之官位，漢宣帝任命黃霸，及漢武帝藉助汲黯名望等四人故事，運用上四下三錯綜句型，簡潔有力，又具有變化。後者則表達諸侯歸殷及歸周者上百、上千人，使得商湯、周武王不得廢除或改變封建制，使用排比句法，造就文章警策，彰顯「封建，非聖人之意」主張。

有論者指出古文「變換無方」、「未嘗有定格」，難以評點，⁶³或許如此，古文批語往往駁雜零散，甚至語焉不詳，如上述〈封建論〉批語大致有這些問題。但時文有定格則不然，如《論學繩尺》具體揭示時文程式、文法，使文章肌理脈絡清晰，邏輯清楚。如魏天應旁批徐霖〈太宗治人之本〉論首：

英主之仁天下也（太宗治人），必求夫植立之要（植立指本字，要字含重

⁶³（清）唐恩溥：《文章學》（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年，《歷代文話》），頁8746，「時文可以評點，而古文不可以評點也。」

刺史意），此其慮深遠矣（與後面相應）。天下之大勢雖散闊區分（言其廣也），而不可以偏致其仁愛斯民之意（應主意仁字，孟子堯舜之仁不偏愛人）；然古之聖王不計其勢之廣也（應大勢散闊區分意），思夫天下之勢自有根本者存（粘上勢字，出題上本字，此勢字自柳文〈封建論〉中來），從其根本而植立之（粘上文，應破題植立字），則森羅列建（列建諸侯），相與扶持天下於安靜熙洽之中，而吾仁遂矣（說治人之本在諸侯，應主意仁字）。故以一人而君天下（謂古者聖人之治人），聖人不敢私擅之已而獨理之也（必資人而共理之），分土地而設司牧（列建諸侯，以司牧萬民），使之各制其國，而各子其民（諸侯之職），以植立大勢之根本（應破題植立字，及接題大勢字），然後聖人之德意惠利藉此以孚於天下（聖人之仁方可以徧天下），此古者建諸侯之意也（古者諸侯如唐之刺史）。唐之太宗識之（識治之本在於建侯），深思極慮（應破題慮深遠意），惻然念治人之本，而歸重於刺史之職（本出處意）。夫刺史者、古諸侯之職也，大勢植立之本也（應小講意），太宗之治天下於是有深根固蒂之仁矣（應本字、應仁字，前漢諸侯王表昔周封建八百同姓，五十有餘，深根固蒂為不可拔者也）。

徐文破題僅使用二十字立論，可謂「簡而切當」。⁶⁴而旁批逐一云「太宗治人」、「植立指本字，要字含重刺史意」、「與後面相應」，揭示題意。接題則從「天下之大勢雖散闊區分……而吾仁遂矣」，以為天下之勢雖廣闊，古代聖王思及「森羅列建」，以植立其根本。至於小講，從聖人「分土地而設司牧分土地而設司牧，使之各制其國，而各子其民」，發揮題意，再次強調「以植立大勢之根本」，此乃「古者建諸侯之意」。然後繳結至題目、立意，唐太宗「惻然念治人之本，而歸重於刺史之職」，「太宗之治天下於是有深根固蒂之仁矣」。以上從破題、接題、小講至繳結，即為本文冒頭，可謂「立意詳明，句法嚴整」（〈止齋論訣·

⁶⁴（宋）馮椅：「破題貴簡而切當，含蓄而不晦。一句兩句破者，上也；其次三句；又其次四句者，漸為不得已。」收於《論學繩尺·諸先輩論行文法》，頁74上。

破題》)。《論學繩尺》一書中尚使用冒頭、冒子、破題、接題、承題、小講等程式術語，⁶⁵其實冒頭即是冒子，包括破題、承題（接題）、小講等。⁶⁶從南宋中期陳傅良〈止齋論訣〉所提出「破題、原題、講題、結尾」時文程式，演進至晚宋愈加嚴密精細，進而成為明清八股文之濫觴。⁶⁷

其次，《論學繩尺》選文旁批中反覆出現「應主意」、「應破題」、「應冒頭」等，不斷以「應」字剖析文章「意脈貫穿」。呂祖謙有云「看論須看主意，然後看過接處」，「作論要首尾相應，及過處有血脈」，陳傅良亦曰：

既能圓轉周流，則常看人之段落過度處，近日名公多是上段引起下段意，不然別作一道理，使之聯屬，故意脈貫穿，終篇不識絕處，無片言可增減，殆與渾金璞玉無異。（〈止齋論訣·講題〉）

故一論之意，首尾貫穿，無間斷處，文有餘而意不盡。（〈止齋論訣·結尾〉）

時文論體講求「主意」、「首尾相應」、「意脈貫穿」等正是學習古文文法，如呂祖謙《古文關鍵》曰：「如何是主意首尾相應」，即是揭示文章前後彼此聯繫、照應的關係。呂氏又云：

⁶⁵ （宋）謝枋得批選蘇軾〈王者不治夷狄論〉尾批「此是東坡應制科程文六論之一，有冒頭，有原題，有講題，有結尾，當熟讀暗記，始知其巧」，可知宋末已普遍使用冒頭術語。見（宋）謝枋得批選，（明）李廷機評訓：《文章軌範》，卷3，頁146。

⁶⁶ 祝尚書〈南宋論體文的程式法〉指出論頭（冒子）包括破題、承題（接題）、小講（起講）、入題（舉題）。收於氏著：《宋元文章學》，頁298-301。

⁶⁷ 《論學繩尺》曰：「其破題、接題、小講、大講、入題、原題諸式，實後來八比之濫觴，亦足以見制舉之文源流所自出焉。」（頁72下）。朱瑞熙〈宋元的時文——八股文的雛形〉一文從《論學繩尺》歸納出論體時文「破題、接題（承題）、小講、繳結、官題、原題、大講（講題）、餘意、原經、結尾等十個段落」，經義亦是如此，「終於形成一種近似明清時期八股文的新文體——十段文」。收於氏著：《嚬城集》（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1-22。

或緩或急，或顯或晦，緩、急、顯、晦相間，使人不知其為緩、急、顯、晦，常使經緯相通，有一脈過接乎其間，然後可。蓋有形者綱目，無形者血脈也。（頁 21）

緩 / 急、顯 / 晦，一正一反形成「經緯相通」，且在經緯錯綜中「有一脈過接乎其間」，顯現於外為「綱目」，即文法；潛藏於內為「血脈」，即意脈。⁶⁸統計徐霖〈太宗治人之本〉批語，大致出現二十八次「應」字，如後面相應、應主意、應前意、應仁字、應本字、應勢字、應破題、應小講、應冒頭等，除上述冒頭引文外，以下再引一段原文及批語：

蓋三代以還，中國之盛未之有焉（謂三代而後，亦無如太宗之治），天下固有無其本，而至此哉（歸在本字）？此天下之勢也（應勢字），帝惟識其勢，而植其本，以基唐家一代之仁（總前面勢字、本字、仁字），此所以為唐之太宗也歟（繳盡本意）？雖然唐之子孫，其所以昌盛綿延，雖更事變、復險阻，而人心連結不可解而仆之者，固以治天下者有其本也（於子孫之安而不搖，皆太宗有治人之本，應本字）。

這段文字稱頌唐太宗之治，及使子孫昌盛綿延；文中再次呼應冒頭中「仁」、「勢」、「本」字。誠如陳傅良云：

論腹正如四通八達之衢，最無繩墨，須時時繳歸主意，分得緊切。如小兒隨人入市，數步一回顧則無失路；若一去不復反，則人與兒兩失矣。初學論者最宜加審。（〈止齋論訣·講題〉）

傅良教導初學者作論，中間論腹之處「須時時繳歸主意」，方能使「意脈貫穿」。

⁶⁸ 可參見蓋琦紓：〈宋代江西詩法與評點文法之交涉及其意義——以《童蒙詩訓》、《古文關鍵》為中心〉，《國文學報》第 58 期（2015 年 12 月），頁 99-127。該文討論綱目／文法、血脈／意脈的關係。

從上述可知時文因程式術語具體清楚，較易標明文章結構、前後相應之肌理脈絡，讀者可藉此掌握「論則析理精微」之文體要求，及「議論文字反覆」作法，進而達到論體「精密圓活」審美效果。

宋代古文與時文往往具有辯證關係，兩者看似對立，其實彼此互相融滲。宋、元之際劉將孫（1257-？）〈題曾同父文後〉云：

文字無二法，自韓退之創為古文之名，而後之談文者必以經賦論策為時文，碑銘敘題贊箴頌為古文，不知辭達而已。時文之精即古文之理也，予嘗持一論云能時文未有不能古文，能古文而不能時文者，有矣；未有能時文為古文而有餘憾者也，如韓柳歐蘇皆以時文擅名，及其為古文也，如取之固有，韓〈顏子論〉、蘇〈刑賞論〉，古文何以加之，而蘇之進論、進策，終身筆力莫汪洋奇變於此，識者可以悟矣。每見皇甫湜、樊宗師、尹師魯、穆伯長諸家之作，寧無奇字妙語，幽情苦思所為，不得與大家作者並，時文有不及焉故也。時文起伏高下、先後變化之不知所以，宜腴而約，方暢而澀；可引而信之者，乃隱而不發；不必舒而長之者，乃推之而極。若究極而論，亦本無所謂古文，雖退之政未免時文耳。⁶⁹

劉氏以為古文、時文不該僅以科舉／非科舉文體劃分兩者，應積極從「文字無二法」、「辭達」來看待兩者共通之處。又其論及唐宋古文家擅長時文者必能做古文，如韓愈、柳宗元、歐陽脩、蘇軾；反之，則不必然，如皇甫湜、樊宗師、尹洙、穆修。換言之，唐宋古文大家亦是時文高手。蘇軾曾〈與二郎侄〉：

汝只見爺伯而今平淡，一向只學此樣，何不取舊日應舉時文字看，高下抑揚，如龍蛇捉不住，當且學此。⁷⁰

⁶⁹ （宋）劉將孫：《養吾齋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99冊），卷25，頁242上。

⁷⁰ （宋）蘇軾著，張志烈、馬德富、周裕鍇主編：《蘇軾全集校注·佚文彙編》，卷4，頁8664。

應舉文章在有限篇幅展現個人學識、才華，必須更講求寫作技巧，方能贏得考官青睞。故東坡指點姪子先去學習自己早年「高下抑揚」時文，而不是如今「漸老漸熟」平淡文字。《古文關鍵》有云「學韓簡古，不可不學他法度。徒簡古而乏法度，則樸而不文」（頁18），主張先學法度方能求簡古。又劉氏所謂「時文之精即古文之理」，其實，理精往往來自於法密，尤其「析理精微」論體，講求邏輯精密，所謂「義貴圓通，辭忌枝碎」；前文提及時文程式較易標明文章結構脈絡，有助於文法精密，換言之，「理精法密」可以說是時文與古文融通之處。雖然如此，時文程式彷彿兩面刃，一方面促使論體寫作專業化，臻於「精密圓活」；但另一方面過於精密瑣碎，又易流於僵化；⁷¹因此，誠如前述，無論「論體」或「論學」皆以活法為依歸。

六、結論

自唐宋古文運動以來，古文與時文始終具有辯證關係，兩者看似對立，其實卻又相互融滲；時文弊病愈深，時人愈以古文矯正文風，反而更彰顯古文重要性。南宋雖未有古文運動，卻開創文章「評點」新體例，用以指導學子「如何」閱讀與寫作，進而促成古文與時文之間互動、交流。本文即從文章評點探討南宋時文與古文之交涉，因作論是宋代士人之必要條件，故聚焦於「論體」文章，尤其晚宋文章評點尚促成「論學」產生。

本文先從理論方面觀察古文「論體」至時文「論學」之發展，指出古文文法、時文程式逐漸相互融滲，在宋、元之際作「論」已成為專門學問。其次，從具體選文做分析，因《論學繩尺》曾指出徐霖〈太宗治人之本〉源委於柳宗元〈封建

⁷¹ 如朱瑞熙：〈宋元的時文——八股文的雛形〉，頁21，指出宋代時文演變為十段文後所產生弊病有二：「士子難以發揮自己的見解，程文往往空洞無物，廢話連篇」、「只能用於貢舉考試和學校考試，除此之外毫無實用價值。」另張海鷗等：《宋代文章學與文體型態研究》，頁110，提及「南宋論學之興與論體文程式化是相伴而生的，它們既是論體文高度成熟的標誌，也是論體文走向僵化的標誌。」

論》，而徐霖正處於程、朱理學盛行時期，這期間時文如何取法古文，目前學界論述較少；故本文以柳、徐二文為例，藉此探討南宋時文與古文「論體」之交涉及其意義。柳文「聖人不得已」之說雖飽受南宋理學家抨擊，然其文章「間架宏闊、辨論雄俊」，又被評點家所稱許，而成為南宋學子學習對象。至於徐文「以勢立論」源委於柳文，因時文為命題作文，該文尚掌握「認題」關鍵，從「勢」推及「本」，又受理學思潮影響，歸於「仁」心。相對於柳子強力批判分封制之缺失，徐文則著重聖人仁民愛物之心，以為「古者建諸侯之意」，而能跳脫時人對柳文爭議。徐文未像柳文「辨論雄俊」，但仍吸取古文「議論文字反覆」長處，展現論體「析理精微」、「精密圓活」特色。

另本文指出時文為命題作文，審題立意是前提，文章鋪陳皆自此前提開展，而逐漸形成一套程式，這應是時文與古文之重要分野。然古文文法、時文程式卻皆又以「命意布局」為核心，兩者除使用共通文法術語外，時文尚有冒頭、破題、接題、承題、小講、大講等程式術語，時文程式具體標明文章結構脈絡，兩者融滲有助於文法精密；而理精往往來自於法密，「理精法密」亦是時文與古文融通之處。

總之，南宋文章評點可以說落實北宋唐庚提出時文「以古文為法」主張，拙文嘗試以兩篇選文管窺蠡測，揭示南宋時文與古文「論體」融通之處；筆者以為除啟發明代「以古文為時文」風潮外，⁷²另晚宋時文體現程朱理學思想，但文章仍取法古文長處，可略見南宋以後，道、文二分，「道歸程、朱，文歸韓、歐」之趨向。⁷³宋代以後，文章評點依然方興未艾，時文與古文之辯證亦爭論不休，在古典散文史上仍有繼續探究空間。

⁷² （清）方苞編，王同舟、李瀾校注：《欽定四書文校注》（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1，凡例曰「至正（德）、嘉（靖）作者，始能以古文為時文，融液經史，使題之義蘊，隱顯曲暢，為明文之極盛。」

⁷³ 參見何寄澎：〈文家與理學家之交涉〉，《北宋的古文運動》，頁484。（清）王兆符：〈重刻望溪先生全集序〉記載其師方苞云「學行繼程、朱之後，文章介韓、歐之間」，收於（清）方苞著，劉季高校點：《方苞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附錄3，頁906-907。

徵引書目

一、傳統文獻

- (魏)曹丕：《典論》（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 (晉)陸機著，張少康集釋：《文賦集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
- (梁)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臺北：學海出版社，1991年）。
- (梁)蕭統著，(唐)李善注：《文選》（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年）。
- (唐)柳宗元：《柳宗元集》（臺北：華正書局，1990年）。
- (宋)歐陽脩、宋祁等合撰：《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
- (宋)蘇軾：《東坡志林》（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
- (宋)蘇軾著，張志烈、馬德富、周裕鍇主編：《蘇軾全集校注》（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
- (宋)程顥、程頤：《二程集》（臺北：漢京文化公司，1983年）。
- (宋)唐庚：《眉山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24冊）。
- (宋)呂祖謙：《古文關鍵》（臺北：廣文書局，1981年）。
- (宋)呂祖謙著，黃靈庚、吳戰壘主編：《呂祖謙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
- (宋)陳傅良：《止齋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50冊）。
- (宋)陳傅良撰，(宋)方逢辰批點：《蛟峰批點止齋論祖》（臺南：莊嚴文化，1997年，《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明成化六年朱暄嚴陵郡齋刻本）。
- (宋)眞德秀：《文章正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55冊）。
- (宋)王霆震：《古文集成前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59冊）。
- (宋)吳子良：《荊溪林下偶談》（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481冊）。

- (宋)周密：《癸辛雜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40冊)。
- (宋)謝枋得批選，(明)李廷機評訓：《文章軌範》(臺北：廣文書局，1970年)。
- (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 (宋)魏天應編選，(宋)林子長箋解：《論學繩尺》(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58冊)。
- (宋)劉將孫：《養吾齋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99冊)。
- (元)脫脫等：《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 (明)吳訥等：《文體序說三種》(臺北：大安出版社，1998年)。
- (清)方苞著，劉季高校點：《方苞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 (清)方苞編，王同舟、李瀾校注：《欽定四書文校注》(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年)。
- (清)嚴可均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
- (清)紀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
- (清)林紓：《韓柳文研究法》(臺北：廣文書局，1980年)。
- (清)唐恩溥：《文章學》(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年，《歷代文話》)。

二、近人論著

(一) 專書

- 王基倫：《韓柳古文新論》(臺北：里仁書局，1996年)。
- 仇小屏：《呂祖謙〈古文關鍵〉文章論研究》(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0年)。
- 朱瑞熙：《嚳城集》(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
- 朱迎平：《宋文論稿》(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3年)。
- 何寄澎：《北宋的古文運動》(臺北：幼獅文化公司，1992年)。
- 吳建輝：《宋代試論與文學》(長沙：嶽麓書社，2009年)。

- 李建軍：《宋代浙東文派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
- 林崗：《明清之際小說評點學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年）。
- 祝尙書：《宋元文章學》（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
- 柯慶明：《古典中國實用文類美學》（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7 年）。
- 閔澤平：《南宋「浙學」與傳統散文的因革流變》（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4 年）。
- 梁庚堯：《宋代科舉社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 年）。
- 張海鷗、吳承學、彭玉平：《宋代文章學與文體型態研究》（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18 年）。

褚斌杰：《中國古代文體概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 年）。

（二）期刊論文

- 方震華：〈唐宋政治論述中的貞觀之政—治國典範的論辯〉，《臺大歷史學報》第 40 期（2007 年 12 月），頁 19-55。
- 王德權：〈「士人入仕」的再詮釋—柳宗元「封建論」的一個側面〉，《漢學研究》第 26 卷第 2 期（2008 年 6 月），頁 71-100。
- 李宗翰：〈馬端臨之封建論與郡縣國家觀〉，《新史學》第 22 卷第 4 期（2011 年 12 月），頁 5-53。
- 蓋琦紓：〈宋代江西詩法與評點文法之交涉及其意義—以《童蒙詩訓》、《古文關鍵》為中心〉，《國文學報》第 58 期（2015 年 12 月），頁 99-127。
- 蓋琦紓：〈南宋古文評點的「關鍵」、「文法」與「文勢」之分析——以《古文關鍵》、《崇古文訣》為中心〉，《淡江中文學報》第 38 期（2018 年 6 月），頁 81-112。
- 劉祥光：〈宋代時文刊本與考試文化〉，《臺大文史哲學報》第 15 期（2011 年 11 月），頁 35-86。
- 鄭芳祥：〈時文如何取法古文—以《蛟峰批點止齋論祖》為例〉，《淡江中文學報》第 39 期（2018 年 12 月），頁 70-100。
- 羅時進、劉鵬：〈唐宋時文考論〉，《文藝理論研究》第 4 期（2004 年），頁 63-71。

(三) 會議論文

楊玉成：〈閱讀與規訓：南宋科舉評點與印刷文化〉，「傳統中國的社會生活與文化研討會」論文（南投：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系、中國語文學系，2007 年 1 月 7-8 日），頁 1-60。

(四) 電子資源

（宋）樓昉：《迂齋先生標註崇古文訣》（元刊巾箱本），卷 12，「古籍與特藏文獻資源」（<http://rbook.ncl.edu.tw/NCLSearch/Search/Index/1>）（檢索日期：2021 年 2 月 1 日。）

The Interplay between Examination Essays in the Southern Song and Classical Proses on “Argumentation” in Pingdian (Marginalia): Liu Zongyuan’s *On Feudalism* and Xu Lin’s *Tang Taizong’s Political Idea*

Ko, Chi-Shu

Professor, Center for Language and Culture,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selection of talents based on political essays since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in the mid-North Song Dynasty, some abuses gradually appeared. After Tang Geng proposed “using Tang-Song prose as the method”, prose pingdian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had promoted the interaction of Tang-Song prose and examination essay. First of all,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argumentation” in classic proses and examination essays, the writings gradually specialized and technical. Secondly, To analyze pros and cons of Liu Zongyuan’s *on feudalism*, and how Xu Lin’s *Tang Taizong’s political idea* to learn it. Although the people of Song Dynasty criticized the viewpoint of Liu’s article, they still praised it as worthy of study. Xu’s some opinion was from Liu’s article and learned the strengths of Tang-Song prose, but it reflected Cheng-Chu Neo-confucianism.

Furthermore, thinking over the topic and forming a clear conception are the premise for the named composition of examination essays, laid out from this premise, and

gradually form a set of procedures. This should be quite different between examination essay and classical prose. But they both used common terms of wenfa to show the structure and context of the article. The fusion of the two helps to logical precision. After the Song Dynasty, the books of prose pingdian continued to be published, and the dialectics of examination essay and classical prose were also debated. This topic should be continuously researched in the history of classical prose.

Keywords: Pingdian (Marginalia), Argumentation, Wenfa, Examination Essay, Tang-Song Prose